

从原始共同体到民族共同体^{*}

——齐亚·格卡尔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上）

刘中民

内容提要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泛奥斯曼主义向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转化中，格卡尔普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格卡尔普的基本思想包括：（1）人类共同体可以划分为两大谱系，即“原始共同体”和“民族”。“原始共同体”可分为4种类型：以氏族为基础的无差别的共同体；以氏族为基础的有差别的共同体；图腾组织全面退化的种族共同体；衰退的原始共同体。民族分为神学的、法定的、文化的、曾经独立但在后来失去独立的民族4个亚种类。（2）宗教认同是与帝国相联系的落后的心理认同；民族认同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先进的认同方式，从宗教共同体走向民族国家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3）世俗民族主义思想，即：主张宗教与政治分离，反对宗教干预政治。

关键词 格卡尔普 土耳其 原始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 刘中民，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在伊斯兰世界，土耳其世俗化的彻底性应归功于世俗民族主义对待伊斯兰教态度的彻底性。凯末尔确立的世俗民族主义，使民族认同超越宗教认同，成为现代土耳其政治认同的基础，并且缔造了伊斯兰世界第一个成功的世俗化、现代化模式。因此，在研究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过程中，人们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凯末尔主义并不为怪。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长期研究中，学界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即对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 1876-1924）思想的忽视。据笔者所知，在西方学术界，研究格卡尔普思想的作品也仅有尼亚兹·伯克斯（Niyazi Berkes）编辑并翻译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与西方文明：齐亚·格卡尔普文选》，而我国对格卡尔普思想的研究很薄弱。事实上，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泛奥斯曼主义向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转化中，格卡尔普的思想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思想进行研究与分析，对于认识土耳其世俗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确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格卡尔普所处的时代背景及生平

在奥斯曼帝国解体前，奥斯曼土耳其人并无现代的民族认同，土耳其民族认同的确立是在经历了奥

^{*}本文系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8年上海市教育科研创新项目“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互动关系研究”、2007年上海市曙光学者计划“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及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¹ Niyazi Berkes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West Civilization, Selected Essays of Ziya Gökalp*,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该书为收录格卡尔普作品的文集，本文对格卡尔普思想的研究主要借鉴了这部著作。

斯曼帝国晚期百余年的缓慢变化后，最终通过凯末尔革命完成的，并实现了世俗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否定。“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有悖于伊斯兰教和奥斯曼传统的普世主义的信条，伊斯兰教和奥斯曼传统都拒不接受民族国家的思想”。经过凯末尔革命后，“民族主义成为新的土耳其共和国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土耳其民族国家或是一种现代政治制度，取代一切宗教、地方和集团的个性和忠诚。”“伊斯兰教在政治中被‘剔除’，宗教分歧的重要性也缩小了。现代的民族概念事实上超越了宗教忠诚，并建立了新的对民族国家的忠诚。”^①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看，对凯末尔的世俗民族主义思想进行高度评价是毫不过分的。因此，学术界在论及现代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时，无不从凯末尔主义入手，这与凯末尔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缔造者的身份有重要关系。但是，人们却往往忽视格卡尔普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客观而言，格卡尔普对凯末尔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他在阿塔图克激进改革的早期就已经告别人世，但是人们可以从这些改革主流趋势的背后发现格卡尔普的思想”，“他的许多思想都随着阿塔图尔克民族主义体制在安纳托利亚的建立变成了现实”。^②

齐亚·格卡尔普，1876年出生在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南部迪亚巴克尔（Diyarbakır）的一个乡村小镇，从小就怀有爱国热情。他没有多数伊斯坦布尔学者到欧洲学习的阅历。当他1896年离开家乡到伊斯坦布尔时，社会上对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土耳其主义的争论充斥着伊斯坦布尔思想界，这种状况使泛伊斯兰主义、苏菲神秘主义、西方人文主义都对格卡尔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形成了他后来学术研究的几个重要领域，即土耳其文化、伊斯兰教、现代西方文明，他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也主要围绕这几个方面的论述形成。尽管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之前他的思想还相当模糊，但是在宪政革命的年代，格卡尔普很快就成为知识圈和思想界的知名人物，后来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著名的社会学教授，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③格卡尔普的作品涉及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其主题是土耳其如何适应西方文明的问题，以及土耳其在适应西方文明的努力中如何与奥斯曼土耳其和伊斯兰传统进行协调，即土耳其人作为一个民族，伊斯兰教作为他们的宗教，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应该如何对待。^④由于格卡尔普的思想都以论文和散论的形式发表在报刊上，其社会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他的思想无疑为后来的凯末尔民族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富素材，同时也构成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思想积淀，从他的思想中人们或许可以找到土耳其能够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实现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历史基因。

格卡尔普的人类共同体思想

格卡尔普指出，人类共同体是人们所珍爱并通过深刻的情感与之相联系的社会群体。共同体概念属于社会的范畴，是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他还指出：“当我们接受共同体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现实时，我们只有从社会因素中寻找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⑤他认为，既然共同体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就应对其进行区别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群体”的概念，指出社会群体是个体凭借特定的团结形式密切联系总体，诸如家庭、村落、种族、阶层、种性、教会（乌玛）、国家或民族，社会机构是思想与行为的特定模式，诸如宗教信仰与仪式、道德和法律规范、语言与审美规则、经济模式，以及科学技术，并以自愿或强制的方式被其成员所接受，因此完全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划分。他认为，人类共同体可以划分为两大谱系，即“原始共同体”和“民族”，原始共同体是人类的早期社会类型，其形式是氏族，即人们通过宗教亲缘关系构成的家族群

^① Kan al H. Karpat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p. 297-298.

^② Niyazi Berkis op. cit., introduction, p. 1.

^③ See *ibid.*, pp. 20-21.

^④ See *ibid.*, p. 1.

^⑤ Ziya Gokalp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mmunities", in Niyazi Berkis op. cit., p. 116.

体。在原始人群中，人们相信有共同的祖先并共同承担氏族的义务，却丝毫没有公共权威和个人权利。氏族的权威具有宗教特征，氏族的头人同时发挥宗教职能。¹

格卡尔普认为，“原始共同体”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1)以氏族为基础的无差别的共同体 (Undifferentiated Communities with a clan basis)，即共同体由若干无等级差别，而只有自己图腾的氏族构成，它构成了原始共同体最简单的组织 (如澳大利亚的土著社会)。(2)以氏族为基础的有差别的共同体 (Differentiated Communities with a clan basis)，信仰图腾崇拜的氏族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已处于分裂状态，在氏族的基础上，特定的社会组织诸如阶层、武士阶层、宗教派别开始从氏族中产生 (如北美印第安人)。(3)图腾组织全面退化的种族共同体 (Tribal Communities in which Totemic Institution is Entirely Lacking)，在这种共同体中，图腾信仰开始退化，且向真正的人类社会转变，父系世袭日益取代母系世袭，氏族逐步失去其团结的力量，共同体开始认识到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独特同质性，种族团结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如非洲的部族)。(4)衰退的原始共同体 (Degenerate Primitive communities)，即氏族已经四分五裂，但是民族组织尚未产生，家庭开始从父系氏族中分离出来。^④

格卡尔普认为，民族可以划分为4个亚种类^⑤：

1. 神学的民族 (Theocratic nation) 统一的民族意识业已产生并表现为对神的共同崇拜和公共权威的出现，氏族和种族组织已消失并让位于宗教的公共法律，“宗教公共权威体现在以神的授权作为合法性基础的统治者身上”^{1/4}，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开始出现，如古代的东方、中世纪的欧洲和阿拔斯王朝。他又把这种民族称为以村落为基础的民族。

2. 法定的民族 (Legislative nation) 在这种民族中，城市摆脱了封建地主的权威，并通过多样化的组织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发起对封建权威的挑战；城市文明开始独立于农业文明，个人所有制和个体民主逐步奠定了基础，城市的行政管理以公共意见为基础。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公共舆论开始与宗教公共舆论发生分离。民族统治者的权威来源于立法，且世俗的法律开始产生。政府不再以神圣的律法而是以人民的主权即公共政治权威为基础。在神学的民族中，民族的权力体现在宗教当局手中，但是在法定的民族中，民族的权力体现为法定的政治权力。”^{1/2}

3. 文化的民族 (Culture-nations) 格卡尔普认为，原始的、神学的、法定的民族尽管有各自的语言和习俗，但它们还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文明，往往是几个民族共同参与和分享一个普世的文明。“当一个民族在普世文明机构中打上自己民族语言和民族气质的烙印时，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独立民族文明的民族即文化民族”。民族文化“这个系统由宗教、道德、法律、美学、语言、经济、技术等方面构成”，“存在于民族内部各个公共领域的同质性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础”。文化民族与法定民族的相同点在于，“独立的政治权威与宗教权威平行存在，同时在文化民族中还有一个独立于宗教和政治权威之外的文化权威”，并具体体现在道德、经济、艺术、文学、科学等各个领域，“在文化民族中，人民构成了其文化的代表，因为文化构成了民族意识的具体表现。”^{3/4}“只有在文化民族阶段，独立于行政和法定权力之外的司法制度才能得到确立。最先进的民族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进化，但是目前没有一个民族已经进入这一阶段。”^⑧

4. 曾经独立但在后来失去独立的民族 (Nations which have lost their independence after once having been independent) 也许是含义的显而易见，所以格卡尔普没有对这种民族加以详细说明，只是举

¹ See Ziya G. Kalp,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ommunities", in Niyazi Bekir, op. cit., p. 117.

^④ Ibid., pp. 118-119.

^⑤ Ibid., pp. 119-123.

^{1/4} Ibid., p. 119.

^{1/2} Ibid., p. 120.

^{3/4} Ibid.

^⑧ Ibid., p. 122.

例指出当时的波兰民族属于这种民族类型。

格卡尔普的政治共同体思想

格卡尔普对当时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关于共同体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指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每个种族和民族都是独特的并有自己的特征。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无社会类型的划分，只有社会个体。每个社会自身就是一个无法进行类分的个体”。而“对于哲学家而言，国家、民族、文明和种族都是人类社会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具体表现。对于他们而言，只有一种社会类型即人类社会。”¹ 格卡尔普认为，历史学家的观点过于强调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而哲学家则过于强调社会发展的抽象性和普遍性，都是不可取的。他还认为比较可取的是社会学的观点，即把社会分为“原始共同体”和“民族”两大谱系。他指出，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由道德团结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群体，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基于共同感情和信仰的社会和基于社会劳动分工的社会，前者即“原始共同体”，后者即“民族”。^④ 格卡尔普将社会团结划分为两种形式，意在说明宗教共同体属于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而“民族共同体”属于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他认为，在正确揭示民族概念的内涵之前，必须清楚种族共同体、族裔共同体、宗教共同体、人民、国家等概念的含义。他指出，种族在本质上是一个动物学和生物学的概念，即人种的划分；族群是个最易与种族混淆的概念，族群与种族的区别在于族群使用共同的语言；宗教共同体“乌玛”是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社会群体如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它可由不同的种族和族群构成；人民是指构成一个国家的公民，在一定场合也可特指民族；国家是拥有政府、领土和人口的群体，国家根据其演进可以划分为族裔国家、帝国、民族国家等形式。^④

格卡尔普指出，历史演进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是新兴的民族国家正在取代传统的帝国，并在帝国解体的基础上出现了民族国家。“民族作为与帝国共存了很长时间的族群开始为重新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斗争。”^¼ 中世纪普世性帝国存在的基础就在于普世性宗教和普世性文明，它们把不同的族群统一在一个帝国之内。在帝国时期，“族群共同体由于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宗教政治共同体或一个更大的文明的一部分而丧失了他们的身份，”甚至“一些族群共同体在融入了一个更大的机体后便失去了自我而永远无法再生，……它们的语言和民族性也永远无法得到重建。但是许多族群共同体在失去了它们的语言和特征后又赢得了再生。在它们再生的过程中，其复兴首当其冲地表现为民族语言的复兴”，同时也是“民族语言开始与帝国及其宗教分离”的过程。^½ 他指出，民族意识的复兴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种历史进步潮流。“民族必然通过中央集权化、同质性和劳动分工而成为一个民主社会。因此，乌玛、帝国和普世文明都是向民族崛起演化的阶段。当民族开始有机地组织自身时，它们将不再与帝国的政治组织、乌玛的宗教组织和普世的文明共存。它们的政治组织将趋向于宪政，法律将趋向于独立于宗教之外，社会将趋向于民主。宗教的现代化也将成为必然，因为如果宗教不融入民族的生活，将意味着乌玛依然继续存在。与此相同，如果民族文化不能从普世文明中独立出来，将意味着民族生活尚未开始。”在普世性的帝国内，宗教有包揽一切的垄断性，宗教被强加在各民族身上，而不允许民族认同的存在。“现代文明不应该为宗教所垄断，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应能够包容信仰其他宗教的民族。民族不再是乌玛的组成部分，但可以成为现代文明的单位。在过去若干个帝国可以成为一个乌玛共同体的单元，但是民族和现代国家不可能是乌玛的构成单元。”^¾

¹ Ziya G kalp op. cit, p 123.

^④ See *ibid.*, p. 124.

^④ *ibid.*, pp 126- 128.

^¼ *ibid.*, p. 128

^½ See *ibid.*, pp. 131- 132.

^¾ *ibid.*, pp. 120 - 122.

格卡尔普能够对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进行如此详尽系统的理论分析,并对与之相联系的种族、族群、人民、国家等概念进行详细的区分与界定,这不仅在土耳其的历史上,即使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

格卡尔普的世俗民族主义思想

格卡尔普认为,宗教的社会功能决定于社会的演化,即宗教在不同时期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在原始社会,只有一种权威即宗教权威,因为政治和文化权威还没有得到独立的发展。”“宗教机构发挥着文化和政治机构的职能,因为社会还没有政治和文化机体。也就是说,乌玛的职能就是国家和民族的职能。”但是,在现代社会,“在宗教权威之外,政治和文化权威已经存在”,“一个以政治传统为基础形成的政治权威就是国家,而根据文化权威产生的统一的共同体就是民族。”现代社会与原始社会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在宗教权威之外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得到了独立发展,并相应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功能。在宗教权威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始社会,具有超自然特征的宗教权威构成了政治权威的来源,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是合而为一的。在现代社会,“尽管宗教习俗依然存在,但是它只能涵盖精神领域的思想与情感,而不能延伸到已有世俗特征的机构。世俗机构以政治和文化权威作为权力的来源,并不断根据对生活的探索而进化。”与此同时,由于独立于宗教权威之外的文化权威的确立,人类的道德、审美、语言、经济、科技都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确立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总之,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各领域的价值标准得到独立发展,“社会的每个分支都在本领域内独立发挥自己的职能。”格卡尔普认为,“宗教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赋予其他机构在本领域内的自由”,而宗教的社会职能就是通过善与恶的说教及其宗教义务完成其道德职能,而社会的政治职能自然应该属于独立于宗教之外的世俗政治机构。¹此外,格卡尔普还从伊斯兰教与国家、伊斯兰教与法律、伊斯兰教与现代文明、哈里发制度等各个方面说明了政教分离的必要性。

总之,格卡尔普通过区分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民族共同体与宗教共同体、世俗与宗教等各个方面,阐述了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对于确立土耳其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属性,指导土耳其脱离帝国思想和宗教乌玛思想的束缚而走上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格卡尔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的理性色彩和哲学思辨色彩在穆斯林思想家中也是独具特点的,反映出他对18、19世纪英、法启蒙思想和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深刻体察,格卡尔普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还体现在他对文明与文化的关系、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土耳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由于他把民族和人民视为最根本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单位,他为土耳其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国家,并最终通向民主开辟了道路;由于他把土耳其与神学乌玛概念区别开来,为土耳其宗教、文化和文明的世俗方向准备了条件;他通过强调在土耳其文化基础上融入西方文明的可能性为土耳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进而为土耳其“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和成功完成这种转型提供了新的目标。”^④凯末尔主义中以共和制取代苏丹制度和哈里发制度的自由民族主义,倡导改革的世俗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属性,反对泛奥斯曼主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均可以在格卡尔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中找到其思想来源,这或许是土耳其得以确立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基础之一。当然,由于深受德意志浪漫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倾向,我们在研究格卡尔普的民族主义思想时,对其泛突厥主义思想必须要加以甄别,本文对此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See Ziya G kalp,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s", in Niyazi Berkis op. cit., pp. 185-193.

^④ Niyazi Berkis op. cit., pp. 30-31.

From Primitive Community to Nationalism Community

—Ziya Gökalp and His Study on Turkish Nationalism (1 of 2)

Liu Zhongmin

pp. 26– 30

The theory of Ziya Gökalp once played important role for members of Youth Turkey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Pan-ottomanism to Kemal's nationalism. The main contents of Ziya Gökalp includes (1) Human being community has two branches Primitive community and nation. The primitive community includes four kinds of types undifferentiated Communities with a clan basis, differentiated communities with a clan basis, tribal communities in which totemic institution is entirely lacking

degenerate primitive communities. (2) The identity of religion is a backward psychology identity corresponding to past empire and the identity of nation is corresponding to advanced national stat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historically to transfer from religious community to national state. (3) Advocating of secular nationalism, that is advocating dividing of religion from politics and objecting to religion's intervention in politics.

On the Strat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 Case Study on the 1980 Coup d'etat in Turkey

Zhou Shuqing

pp. 31– 36

Turkish military power at last intervened politics in 1970s when Turkey met with sever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is and several governments failed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first thing for the military regime was to stabilize the civil situation and rebuild new power structure was the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coup. In 1982, the implement of new constitution was the mark of recovering civil officer politics and the substantial step to do that was to conduct the general election next year. The restoring of civil government helped Turkey to gain the reputation differently from some South American states

then were regarded as military autocratic regimes. The original aim for the military to launch the coup d'etat was to maintain itself interest, but the result objectively was the "revision" of democracy. The purpose of the coup launched by Turkish military consists in maintaining the benefits of their own, and the consequence of the coup is to get the democratization to the right place. The 1980 coup d'etat is not a tragedy of democracy, but the "rational reduction" of the democratic framework, not the frustr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but the adjustment of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mode.

The Russia– Turkey Relations Since 21st Century

Zhang Laiyi

pp. 37– 41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Russia and Turkey are trying to establish a new partnership relation with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long-term stability and bilate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dismissing historical fouls and intervention from U.S. There are frequent visits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have great promoted friendly cooperation in all kinds

of fields, and a stable and fine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looks active and potential, and there seems great advantage of geopolitics and better realistic conditions for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new circumstance, Russia and Turkey will strengthen their friendly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ir good cooperation will start new steps.